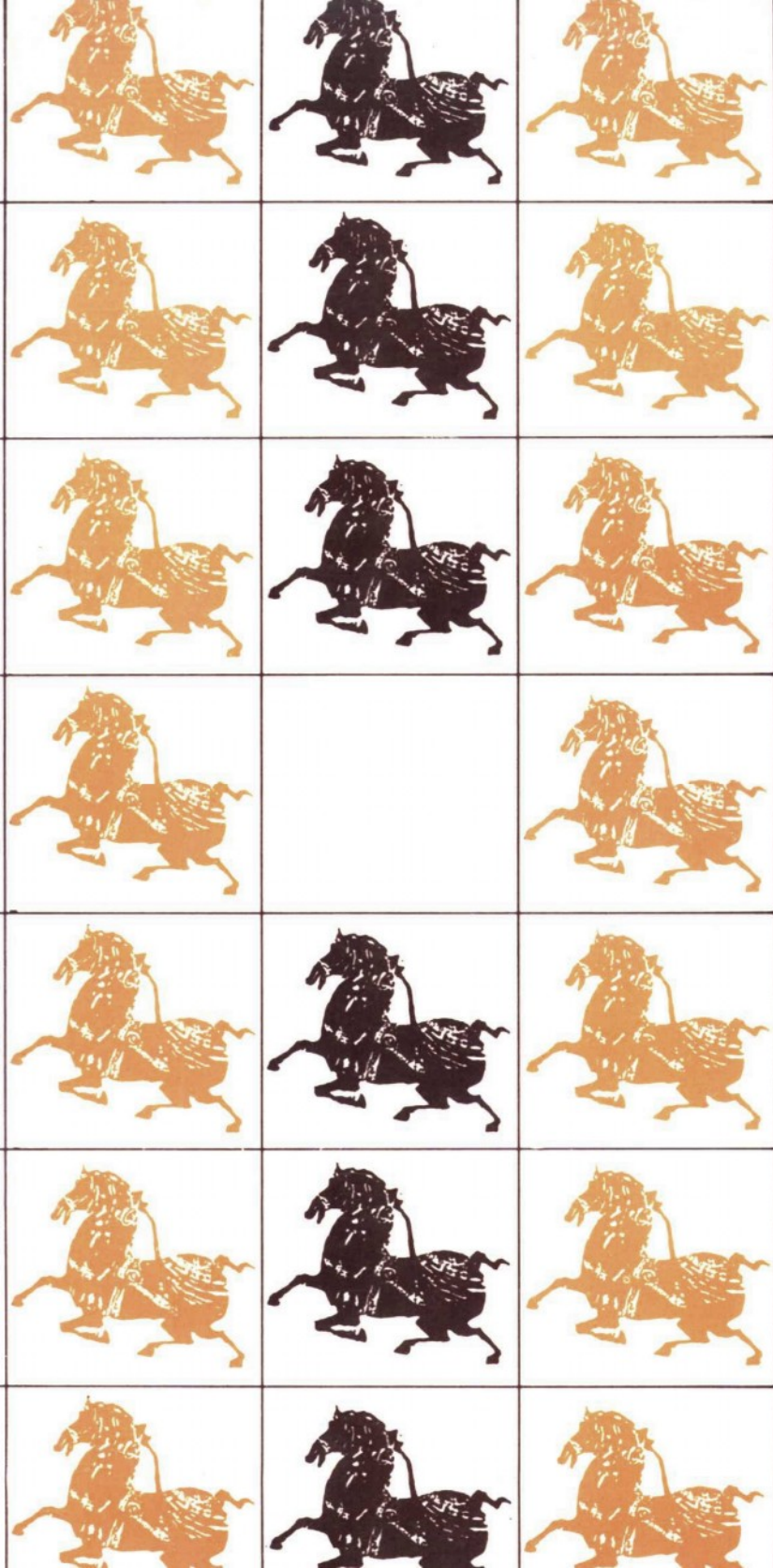


黃俊傑 著

歷史與現實



黃俊傑 著

歷史與現實

漢新出版社印行

新學
社
PDG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歷史與現實

作者：黃俊傑

發行者：漢新出版社

出版者：漢新出版社

總經理：漢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二段三八一號

電話：(〇四二)二二八〇三四

郵撥帳戶：二二五一六四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八號

電話：(〇二)九八三一〇六一、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六五三號

定價每冊新臺幣一五〇元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調換

自序

「歷史與現實」這本書收集了作者近日所撰短稿十四篇。這十四篇文字大部份都不屬於專業性的研究論文，作者嘗試着以一個史學工作從業人員的立場來思考與現實生活中相關的若干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反過來刺激作者追索某些特定的歷史現象及事件的濃厚興趣。這本書取名為「歷史與現實」，一方面是因為書中大部份文字的撰寫是由於「歷史」與「現實」互動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歷史的知識」與「人生的現實」之關係一直是作者長久以來所關心的重大問題之一。今乘本書集稿付梓之便，作者願就此一問題略申管見，庶幾全書各篇文字不致成為無頭緒之亂絲，而讀者亦可藉此尋其脈絡，不致如張鷟初入大夏之不能得月氏要領也。

歷史知識在現實生活中具有什麼作用？這一個問題不僅是專業的史學工作從業人員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也是一般社會大眾所深感困惑的問題。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處理都是出之以一種直線的思考方式，將「過去」與「現在」一刀切為二截，認為史學研究所探討的是過去的世界，是一個早已一去不復返的世界，故與我們所處的「現在」無關，因此，歷史知識在現實生活及人生之中就不具有任何意

義，而史學研究也就成爲一小撮博古家玩物喪志的遊戲了。這一種態度似是而非，但卻對古往今來的史學工作者構成重大的壓力，使他們不得不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二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八六年）就曾感受到他所處的社會對歷史知識的鄙視態度而深自慨嘆：「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這種鄙視歷史知識的態度不僅古今一脈相承，而且中外如出一轍，誠所謂源遠流長，東西呼應！史學工作者飽受此種「意見氣候」之凌虐，史學工作遂形同逆流游泳，而史學家載筆立言撰寫史籍之前竟必須爲其工作之價值先作肯定，例如美國史學家布林頓（Crane Brinton, 1898—）、克里斯多夫（John B. Christopher, 1914—）及吳爾夫（Robert Lee Wolff, 1915—）合寫「西洋文化史」（*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55, 1960）綜論西洋明數千年之發展，但開宗明義卻先分析「歷史的功用」（*The Uses of History*），並針對社會大眾那種「漢摩拉比？那又怎麼樣」（“Hammurabi—so what?”）之類問題作討論以肯定歷史知識的重要性及其價值。事之可哀者孰逾於此？

我們認爲，所謂「史學所研究的是『過去』」，故史學知識與『現在』無關」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以下我們從兩個角度來分析這種說法成立基礎的脆弱。首先，從史學工作者研究歷史現象時所懷抱的問題意識的形成過程來看，歷史時間上的「過去」與史家所生活的「現在」實際上並未斷爲兩極，「過去」與「現在」以一個很辯證性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史學工作者之所以會對「過去」的許多歷史現象特別感到興趣而從事探討，這與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的刺激大有關係。例如滿清入關，明室

覆亡這一個時代的變局使得明末的黃宗羲（梨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在痛定思痛之餘，起而檢討中國政治史上中央權力結構問題而歸結到「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罷丞帝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之結論；再如顧炎武（寧人，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寫「日知錄」，特別分析地方吏治之良窳，這都與他們所親身經歷的時代變局有不可分的關係。從這裡我們可看出，「現在」與「過去」實有一種辯證性的互動關係在焉。因為史學工作者的問題意識常受時代的刺激，所以許多偉大的史著皆不免有時代的投影。陳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先生曾說：「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增加瞭解。」（「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書」），可謂一針見血之言！因此，從歷史致知過程中問題意識的形成看來，我們可以發現，「過去」與「現在」實際上是密切結合為一的。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所說的一句話：「我們只有透過對現在影響最大的史實才能解釋過去」（“you can explain the past only by what is most powerful in the present”）（見：Nietzsche, tr. by Adrian Collins,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1949, 1957, p. 40）。

其次，我們再從歷史知識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來看。歷史學所研究的是過去特定時空中所曾出現過的人或事，所以史學知識有很濃厚的經驗性基礎。但正因為它具有強烈的經驗基礎，所以歷史知識在現實的人生之中每能發揮重大的作用，或作為現實的勸誡，或甚至可以改變現實的狀況。關於史學

知識之作爲現實的勸誡，在中國史學中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司馬遷曾引董仲舒（公元前一七六—一〇四年）的話說，「春秋」一書的寫作就是爲了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史記」，『太史公自序』）的作用。自「春秋」以降，中國史學之所以謂褒貶無非是爲了使歷史知識對人生及現實產生一點積極性的勸誡作用。胡三省（身之，一二三〇—一三〇二）注解「資治通鑑」是這一項看法最具體的說明。身之處於蒙古鐵蹄肆虐於中國的時代，他的民族氣節及愛國情操時時流露於其通鑑注中。例如胡三省有慨於宋人奏疏之冗長，故於「通鑑」：「漢哀帝建平三年，王嘉諫數變易二千石，及勸上畜養大夫」一條特注曰：「……爲相者在於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滕口說也」（陳新會，「通鑑胡注表徵」，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我們通覽通鑑胡注，最能感受到史學知識在諷諫現實、提昇現實上的作用。

史學知識不僅對現實有勸誡之作用，有時更具有改變現實的作用。最足以說明這個論點的莫過於美國獨立革命前夕北美十三州的人士引用希臘羅馬史上民主共和的史實來作爲革命理由這件事實。許多美國開國元勳均廣泛徵引古典作家如荷馬（Homer）、索佛克里斯（Sophocles）、帕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李維（Levy）、味吉爾（Vergil）、西塞羅（Cicero）……等人作品來證成其革命之論據。例如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就曾引用古希臘城邦對待其殖民地之史實來說明大英帝國對待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措施之不合理（關於希臘羅馬史實對美國革命之影響，參考：Charles F. Mullett, "Classical Influenc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Classical Journal*

35:2, 1939, pp. 92-104)。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在一個急驟變遷的時代中，歷史知識常能發揮改變現實的功用。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一般社會大眾所持「歷史知識與現實社會無關」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對歷史知識的重大誤解。但除了非以史學工作為專業的一般大眾之外，許多專業史學家對這個問題也持有近似的看法。他們認為，歷史研究不應與人生價值或現實社會混為一罇，因為歷史研究在還歷史以「客觀」之本來面目，重建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說的過去事實上所發生過的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換句話說，許多專業史學家認為史學研究是一種純粹「客觀」的知識活動，它與「主觀」的人生價值不發生關係。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他們要把歷史學建設得像生物學地質學一樣地「科學」。從歐洲史學史的立場來看，這種說法大體上是十九世紀歷史學專業化以後的產物，它與二十世紀的所謂「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有其思想上的淵源。我們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對蘭克史學的重大誤解(參考：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自序)，僅就史學研究的傳統來講，這種說法也是很可商榷的。自古以來，凡是能感動人心的史學作品沒有不談人生、價值或社會現實的。司馬遷之所以要述貨殖、序遊俠、論大道，無非是爲了反映他所處的時代學術思想及社會經濟活動的一般現實狀況。司馬光(君實，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寫「資治通鑑」不外是要從王朝興亡的史實中，來導引出歷史的教訓作爲現實的鏡鑑。漢代王充(公元二七—九一)曾說：「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明末王船山也曾說過：「所貴乎史者，述

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爲？」（「讀通鑑論」，卷六）。中國史學家一貫的信念是：研究歷史乃所以批導現實，提昇人生之境界。因此之故，在中國的學問傳統中，經學與史學是分不開的，古人說：「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於聖賢；既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徒爲章句」，這句話最能體現這層意思。

史學與人生及現實密切結合爲一，這種情況在西洋史學上也若合符節。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9 B.C.）撰寫「史記」，記述波希戰爭（公元前四九〇—四八〇年）的前因後果，就是爲了使「希臘人與其他民族之間偉大的成就」得以保存下來（Herodotus, tr. by Aubrey de Selincourt, *The Histories*, Penguin Books, BK. I, p. 41）。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 c. 460-c. 400 B.C.）寫帕羅奔尼撒戰史（公元前四三—四〇四年）的經過，也是爲了對人類的現在及未來有所匡助。他說：「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瞭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事件（因爲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爲我的著作尚有裨益的話，我就很滿意了。我的著作不是只爲迎合大眾一時的愛好，而是要垂之久遠的」（Thucydides, tr. by Rex Warner,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BK. I, p. 48）。自希羅多德及修昔的底斯以降，偉大的西洋史家莫不熱愛生命、關切現實、關切人生！因此，部份史學工作者不談「主觀的」人生價值的主張，如就學術之掙脫宗教及權力之桎梏言，自有其可同情的意義，但如就史學研究的目的而言則顯然值得三思。

史學研究的意義何在？史學研究的目的又何在？生在一箇史學衰落的時代裡，我們應嚴肅地反省

這些問題。今日的史學家一方面受到社會大眾歷史意識薄弱化的打擊，而必須撰寫「歷史的相關性」(Gordon Cornell-Smith 與 Howell A. Lloyd 合著·*The Relevance of Histor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2) 的專書來爲自己的職業辯護；另一方面則由於學術過度的分工化、寫作形式之呆板、史學工作者羣體意識之瓦解……等內在因素而在史學本行之內呈現空前未有的危機，使許多史學家爲之憂心忡忡，著文分析此種史學界內在之危機(見：Oscar Handlin, *Truth in Hist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4, "A Discipline in Crisis")。面對上述的外在誤解與內在危機，史學工作者脫離困境進而批導現實的唯一法門就是回歸十九世紀以前中西古典史學的精神世界，從古典史學的舊傳統裏汲取精神上的靈感，開創研究工作的新境界。這裏所謂古典史學的精神就是史學知識與人生現實合一，爲人生而史學的傳統。讓我們引用錢賓四(一八九五—)先生在三十年前所說的一段話來作爲我們自我勉勵的座右銘：

歷史是什麼呢？我們可以說，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經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人生整個已往的經驗。至於這經驗，這已往的人生，經我們用文字記載，或因種種關係，保存有許多從前遺下的東西，使我們後代人可以根據這些來瞭解，來回頭認識已往的經驗，已往的人生，這叫做歷史材料與歷史記載。我們憑這些材料和記載，來反看已往歷史的本身，再憑這樣所得來預測我們的將來，這叫做歷史知識。(見：錢穆，中國歷史精神，臺

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五年修訂初版，頁二）

歷史與人生、「過去」與「現在」是結合爲一的，朱子（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註「論語」『子在川上』章嘗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四書集注，「論語」，四部備要本，卷五，子罕第九，頁四，下半頁），時間之流乃是一個生生不已的延續體，所謂「過去」仍在「現在」發生作用；所謂「現在」之發展亦有其「過去」遺留之因子。明乎此，而後可以語於涵泳歷史，境界歷史！是爲序。

辛酉夏至

作者誌於臺灣大學

目 錄

自序

一、歷史與現實——從歷史研究中問題意識的形成談起	一
二、對文化建設若干觀念的檢討	一一
三、儒學傳統中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二三
四、中國歷史上的羣已關係——從思想史與社會史來看	三三
五、建立羣已之間的平衡關係	四三
六、沉潛與高明之間——和聘尼克教授的對談	四七
七、歷史、人文與社會——與湯瑪斯及詹森教授一席談	七三
附錄(一)傳統與現代的接榫 (C.G. Thomas 及 Richard Johnson 原著)	八三
(二)走出象牙之塔 (C.G. Thomas 原著)	八六
八、從方法論立場論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	九三

九、杜威的實驗主義對胡適的影響——以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為中心的探討	一一七
十、洛夫、沈宗瀚與中國作物育種改良計劃	一四三
附錄：美國如何善助中國？（沈宗瀚英文原著）	一六九
十一、注將心力務耕農——懷念沈宗瀚先生	一七七
十二、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農業建設的看法	一八三
十三、當前農業建設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	一九七
十四、論經濟部農業局設立人文組的必要性	二〇五

一、歷史與現實

——從歷史研究中問題意識的形成談起

一

歷史研究是一種很複雜的知識建構的工作。人類一切的活動包括政治的發展，經濟的榮枯，社會的演變、文化思想的流變莫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但任何一位博聞強記的史學家，不可能也無必要敘述人類活動經驗的一切事實。他只能以高度的選擇性的眼光來淘汰在他看來不具歷史意義的事件而著重他認為重要的歷史事實。一般事實經過史學工作者這一層「別識心裁」（用章實齋語）的工夫就被提昇到所謂「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的層次而成為人類活動中有意義的事件，並成為人類社會的歷史記憶中值得保留的共同財富。但史學工作者把「一般事實」提昇為「歷史事實」這個過程絕對不是恣意的，隨心所欲的。否則歷史研究就成為史學工作者的主觀臆測而毫無客觀價值可言了。在史學研究中，「一般事實」與「歷史事實」的區別很相近於社會學研究中的「一般現象」與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所謂的「社會現象」的區別(見：氏著，社會學方法論，商務人文庫有中文譯本)。正如「社會現象」是指一種社會性的強制力下所產生的個人行為，史學研究中的「歷史事實」是指具有時代意義且是以反映或代表一時代之趨向的事實而言。但史學工作者如何決定某一件史實之是否具有時代意義而可以透露一時代的訊息呢？

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牽涉到史學研究工作的三個層次：史料的考訂、史實的重建以及歷史解釋的提出。史學研究以可信的史料為基礎，故史學知識有很濃厚的經驗性基礎。但盈天地間莫非史料，史學工作者必須對產生史料之人、時、地各項因素作內在及外在之批評以確定史料之可信性；經過這層考覈史料真偽的工夫，才可以進一步依據史料重建史實。但這種重建是擇其大節而非巨細不分，是選擇性的而非全面性的，這項工作類似剪影藝術工作者透過對人物輪廓的強調而彰顯人物之特殊性，史學工作者是透過對若干特殊史實的強調來「通古今之變」。接著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提出史學工作者個人的歷史解釋，亦即是所謂「成一家之言」的工夫。

但是，史學研究工作者從爬梳史料，重建史實，到擷成其史觀在這一系列的研究過程中，研究工作者心中所存有的問題意識實居於主導的地位。心中無問題意識則面對浩瀚的史料將空入寶山而返，無從入手，更不必談疏解史實擷成史識矣。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舉若干史學家爲例加以闡釋。明末大儒王船山(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及黃梨洲(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精研史學，著述宏富。我們如果細繹他們論史的作品，則可以發現，他們在明亡之後研究歷史，泣血於山林之間

從事名山事業實有一個共同關懷之問題意識，此即是：何以明室社稷傾覆清人入關？他們希望從對歷史的探討之中來追索他們所目擊的時代大悲劇的答案。所以王船山著「讀通鑑論」才會「上推數十年中國之治亂以迄於今」（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臺景印初版，頁一一〇六），而歸結到「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盜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同上書，頁一一〇七）的結論。黃梨洲也說：「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黃宗義，「明夷待訪錄」，臺北：新興書局，民國四十八年影印本，頁七），於是他分析歷代政治制度之短長得失，而獲得「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同上書，頁二二）的結論。王船山、黃梨洲畢生寢饋史學，都和他們對於以上所說的這個問題意識的反省息息相關。

再舉一個較近的例子。歐洲近代社會科學大師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一生著述甚多，涵蓋東西數萬里，上下古今數千年，但是他一生治學有一個中心的問題意識，此即是：西方近代社會特徵何在？何以這些特徵只見於近代西方而不見於其他地區？在這些問題意識的驅迫之下，韋伯起而追索所謂「資本主義精神」的淵源，分析它與基督新教倫理的關係；討論中國文化中儒道二家思想與中國史上資本主義不發達的關係等等。我們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史學工作者必然在他的工作過程中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必須具有一個鮮明的問題意識，一個史學工作者才能對他所研究的對象提出具體問題，進行研究。

但是，史學工作者的問題意識如何產生？一般而言，問題意識的產生至少有兩個不同的途徑。一是研究工作者從理論的探討之中，發掘並形成其分析歷史現象的問題意識。近數十年運用社會科學界所提出的理論或模式來分析歷史現象的作品如雨後春筍，推陳出新，例如社會學家帕深恩 (Talcott Parsons) 曾以其社會學之理論架構分析歷史上的社會，而有「從演化與比較的視野論社會」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cliffs: Prentice-Hall, 1965) 一書之撰寫；埃森斯塔 (S.N. Eisenstadt) 則更取所謂「政治系統論」立場論述數千年的中西歷史中所見之帝國，分析其持續發展及其崩潰之內在及外在原因，寫成「帝國的政治系統」一書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69)。這一類的史學研究所受於時代現實問題之刺激者少，所受於其理論背景之影響者多。

關於理論之影響於歷史研究中的問題意識的形成這一點，最具代表性的實例也許仍是韋伯理論對近數十年來史學研究的衝擊。上文說過，韋伯分析人類歷史的問題意識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互有關聯，但韋伯的論旨搏成體系後卻幾乎發展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生命，轉而對此後的歷史研究造成極大衝